

光未然



光未然诗存

朋友！到过黄河吗？
你到过黄河吗？
你渡过黄河上的船夫
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吗？
拼着性命和搏战的吗？
惊涛骇浪已经忘掉的话，
如果那么你已经听吧！



光未然

光未然诗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未然诗存/光未然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6

ISBN 7-5063-1439-8

I. 光… II. 光…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040 号

光未然诗存

作者: 光未然

责任编辑: 杨德华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12.5

插页: 6

版次: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39-8/I·1427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作者小传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诗人，文学评论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一三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老河口市。一九二七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二九年参加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的文化活动。全国解放后先后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剧本月刊》、《文艺报》、《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领导工作。主要著作有组诗《黄河大合唱》、彝族史诗《阿细人的歌》（整理）、诗集《五月花》、《光未然歌诗选》、论文杂文集《风雨文坛》、《惜春文坛》、《江海日记》、《向阳日记》、《文坛回春纪事》等。



握手

第 1 页

当黑色的风暴，
席卷中国大地；
我忍饥穿过长街，一切
熟人视同敌人的时候，
感谢你，真挚的朋友，
你^还~~深~~情地同我握手，
你坚贞地同我握手！

当我开膛破肚，
摘除一串毒瘤；
我^怀~~泰然~~躺在病床，
连在的一切敌人的时候，
感谢你，真挚的朋友，
你深情地同我握手，
你坚贞地同我握手！

1984.5.22

中国作家协会

作者手迹

说明书

小 引

我把自己一九三六年迄今、现存于手头的诗歌作品——大部分是新体诗歌，也包括近些年写的旧体短诗，参照过去出版的几本诗集，选编为这本《光未然诗存》，借以检点自己六十年来有限的诗歌作业，并作为一名老战士迎接新世纪、欢呼新生代的献礼。

我自觉青年时代的诗歌写的带劲儿些；中老年时的作品也还没有丧失朝气。全国解放前后，我在武汉、延安、重庆、昆明、北京等地的诗歌朗诵会上赢得广大青年听众的赞许，增强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时间在前进。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丰富和发展。诗歌创作的风采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我难于接受或一时难于理解的。但我相信：我国当代青年的大多数宁愿接受明朗的、鲜健的、富于朝气的作品。因此我敢于献出这本《诗存》，希望借助于出版家和发行家的热心支持，使它能够送到青年读者手中，跻身于当代艺术竞赛的行列。如果其中某某几篇作品，被青年读者接受并肯定它们的存在，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按照写作年代的先后，这本诗集分为以下七卷：（一）黄河卷（三十年代），（二）屈原卷（四十年代），（三）英雄树卷（五十、六十年代），（四）惜春时卷（七十年代后期），（五）大鹏歌卷（八十年代前期），（六）红树林卷（八十年代后期），（七）星海园卷（九十年代）。

既然这本书是献给新世纪的青年读者的，我就从每一卷中选取一两首或三几首略作说明，说明这些诗歌产生的背景、条件和用意，作为读者阅览或评论时的参考。在说明书的结尾，我也想跟读者们谈谈心，谈谈我重编这本诗集时的一些感想。

一、关于黄河卷（三十年代）

回想青年时代，在救亡运动中，在抗日战争初期，诗歌方面，我是从写作群众歌曲的歌词起步的。写于一九三六年春的《五月的鲜花》，是为自己的一個剧本所写的序歌，该剧在北平东北大学上演时，由教师阎述诗同志谱曲。曲调哀婉悲壮，倾诉了群众共有的心声，在“一二·九”运动后期，随着学生运动、救亡运动的怒涛滚滚，从华北城乡传唱到江南。关于歌词的产生经过，曾经演变为两种感人的传说。一九三七年春，在上海郊区一次《五月的鲜花》群众演唱会上，戏剧性地结识了冼星海、张曙同志，引为知交。一九三八年春夏，我和星海、张曙在武昌昙花林同住一个寝室，真是朝夕相处，肝胆相照。《黄河大合唱》是一九三九年初春在延安时候我和星海的第三次合作。那时我在晋西吕梁山游击区堕马受伤，被送到延安医治。躺在医院病炕上不能动笔。这部大合唱八首四百多行歌词，逐句口授抗敌演剧队女队员胡志涛同志记录下来，星海同志以神奇的速度作曲。当时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大力协助下，由抗敌演剧第三队在延安陕公大礼堂隆重首演的盛况，迄今历历如在目前。明年是《黄河大合唱》诞生六十周年，而伟大的作曲家冼星海和好友胡志涛已先后辞世。我默默哼着歌曲，不禁声泪俱下了！我的左肘关节粉碎性骨折，延安医疗条件不足，送到成都也没能治好。志涛护送我到成都住进医院，她便带着《黄河》简谱稿到重庆，送交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从此这部大合唱在大后方各城市、前方各战区传唱开来。四十年代初期，美国两度出版英译本，爱国

的华侨华人在纽约演出，此后在海内外演唱不衰。为纪念这部诗乐作品六十周年，在音乐界几位热心同志协助下，黄叶绿同志正在编纂一本《〈黄河大合唱〉纵横谈》，其中也包括她新近征得的几位专家的专文。我也顺便在这里预告一下。

在抗日战争初期，在火热的群众歌咏运动中，我大约写过四十几首歌词，单是和冼星海合作的就有十几首，和夏之秋合作的也有《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女青年战歌》等几首，这些都分别编入作曲家的专集和抗战歌曲的合集中。我的大部分歌词写的过于潦草，当时随歌曲广为流传，事后自己也记不清了。这里《黄河卷》中收入了六题十三首。我以为这些是有纪念意义的。

二、关于屈原卷（四十年代）

这一卷收入的，主要是四十年代前半期的作品，写作于重庆、缅甸和昆明。

一九四〇年我旅居重庆（蒋政府的陪都）时候，正值我国国土大部沦丧；日本军队向西南步步进逼；我解放区军民在华北、东南浴血抗战；而蒋政府却一再发动反共高潮；一批卖国贼准备向日寇妥协投降，同时加紧迫害爱国的、进步的文化人。像《屈原》这样悲忿填膺的诗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只是在朗诵会上发表，长期未曾见诸报刊；除了不给报刊编者惹麻烦，也想得便时仔细推敲一下。一压许多年。流离奔波之余，何暇及此？直到建国后的一九五八年，老友陈白尘同志来访，敦劝我在他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照办了。回想重庆时候，我对大鼓说书等民间文艺形式很感兴趣。《屈原》上篇叙事部分，有意从民间说唱形式中略有吸取，而未能运用自如；下篇抒情部分，依靠古诗人某些辉煌诗句的启发，放开笔来写，笔下有痛快淋漓感。不难看出，这一历史题材的诗篇，是针对时局有感而发，但也力避牵强的、浮浅的影射。

主观意图是否产生了相应的效果，只能由细心的读者们来判断了。

本卷中《绿色的伊拉瓦底》，是一九四二年日军吞并缅甸、我逃回云南、息影路南县时写的，抒写了我对缅甸人民、旅缅侨胞的一片深情。历尽艰险后，静下心来倾吐胸怀，也颇致意于诗情画意的谐和，诗句的节奏与韵律，力求收到良好的朗诵效果。次年在昆明龙头村写的《午夜雷声》，则表达了青年诗人对于革命风雷的渴望。这样的日子快到了，于是有了《民主在欧洲旅行》《给新中国》《我嘲笑》这样热情奔放的政治抒情诗。这些诗是在昆明学生运动、民主运动高潮中产生，在朗诵会上发表，有时是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高声朗诵的。当时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云大附中的青年男女们（如今当然是白发苍苍了），想必还有不少人记得当年听取光未然朗诵时在心头引起的共鸣。这些诗闯了祸，于是在李公朴夫妇的巧妙安排下，改名化装混入蒋匪军，过越南，登美舰，越四海，绕东北而逃到北平。

在这卷里，也还有两三篇儿女情长的短章。其中《怀念》所怀念的，是女友、女战士胡志涛。前面说过，她是《黄河》歌词的笔录者，从延安护送我到成都后，只身到重庆，安排《黄河大合唱》歌本出版事宜。事毕回到山西山区党所领导的抗敌演剧第三队时，正值“晋西事变”（西北反共高潮）毒雾未散，演剧队同志们遭受蒋军特务和阎锡山特务的双重迫害。我和志涛音讯断绝，写诗抒怀。建国后胡志涛成为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三年前病逝于合肥。《锁着的箱子》是写给一位年轻的女演员的。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武汉从事戏剧活动。我年轻，她更年轻，默默相爱，从未互相表白。这以后我东奔西跑，她的生活道路和艺术生涯遭受严重波折。一九四〇年初在重庆相遇，她大哭不已而不愿深谈。我写此诗劝勉之。她曾应邀参加我和徐迟组织的文协诗歌朗诵队，稍稍施展她的艺术才能。但她那锁着的箱子始终未曾打开。多年后听说，解放前她病逝于昆明。我的企图开锁的诗竟成为悼词！还有一首《镇魂曲》，是一场意料不到的失恋（其实尚未进入真实的恋爱过程）引起一阵意料不到的丧魂失魄，我写此自慰、自责和自勉。

果然，一曲告成，我又能以光风霁月的胸怀，投入当前严肃的工作与斗争了。

一九四六年深秋我和爱人黄叶绿在北平结婚，随即相偕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其时北京反共气焰嚣张，民主运动陷入低潮。我们没有举行通常的婚礼，而我们大院里的简朴的婚筵和告别酒会却成为文化界友人和民主战士们新近难得的抒发壮志豪情的聚会。我临时撰写的高悬客厅的《不怕秋风动地来》的诗联，为友辈所传诵。关于这次婚礼，我曾在《说起本司胡同》一文（收入拙著《江汉日记》）后段有所记叙。而张恨水先生当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专文，是记叙较详的。

三、关于英雄树卷（五十、六十年代）

进入新中国的五十年代，本是梦寐以求的热情奔放的年代，我却很少写诗，甚至不会写诗了。一来行政组织工作和文艺刊物编辑工作捆住了手脚。二来文艺界风波迭起，心绪繁乱。有时也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只能算半个报章文学家，不算是诗人。本卷选入的，首先是曾经在群众中传唱的十来首歌词，其中自己下过功夫也比较得意的是《三门峡大合唱》。六十年代初期，为了支援越南、古巴和巴拿马人民的抗敌斗争，在朗诵会上发表过几首政治抒情诗。我自己喜欢的是《越南组歌》。

我所以把一九五九年写于广州的《英雄树》（七律二首）选为本卷的题目，因为它确实较为深切地抒发了我在这一时期（三年困难初期）的真情实感，我对壮美事物的仰望，我的自许和自勉。“文革”中期，我在“五七干校”星夜独坐时，回味这首旧体诗，修改了个别字句。反复低吟，从中汲取了抵御风寒的力量。

四、关于惜春时卷（七十年代后期）

“十载金光已浪掷，争分夺秒惜春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州参观一家电子手表厂时，主人要求题诗，便题写了《惜春时》这样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我与文艺界同志们共有的心情。可是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文艺界清理废墟，重建新园，我和一些同志们陷入除旧布新的繁重事务中，越陷越深，很难静下心来写诗。本卷收入长短新旧体八首，以惜春时三字响亮易记，就用它作为分题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是新中国历史命运重大的转折点。我的《十月大游行抒怀》和十二月写出的怀念周恩来同志的长诗《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在朗诵会上宣读，在电视上转播、在报刊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党内外老同志、文艺界老前辈和各界听众与读者的热情鼓励。这是蕴蓄已久的、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诗人独有又是大家共有的时代感情，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

一九七七年写的长篇叙事诗《英雄钻井队》，是在已故诗友李季同志引导安排下，在华北油田参观学习一个多月，深受感动而命笔的。可是我对油田生活到底所知不多，叙事写人，未能得心应手。李季同志是行家，他促请在《诗刊》发表。权当成一个外行的初学者的学习汇报吧。

五、大鹏歌卷（八十年代前期）

一九七九年一场大病后（肠癌两次大手术），得到同志们照顾，工作之余，每年安排短期旅行或海滨疗养，呼吸些新时期的新鲜空气。旅行中不免应邀题写条幅，于是随缘写点旧体短诗。只有《大鹏歌》这首五言歌行，是字数较多、时代感情含量较重的，故取其

作为本卷的题目。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随一批作家友人访问深圳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还是新鲜事。所见所闻，精神为之一振。但我也知道，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与理解，需要有个过程。深圳人在党中央和广东省委领导下，坚持大鹏壮志与开荒牛精神，顶住来自各方面的怀疑、讥笑与怒骂，奋力开拓出一个举世注目的新局面，是可歌可泣的。真想不到，一时来自某某方面的千钧重压，竟使开荒牛动弹不得，大鹏翅受到重伤。虽然特区负责同志安之若素，面不改色，但我们听得的越多，忧忿之情越盛。《大鹏歌》一诗，是在这种心情下写成的。回到广州，在座谈会上含泪朗诵，得到当时省委负责同志和作家们的热情赞赏。书法家谢加因索去原稿，将这四十五行的五言歌行写成手卷见赠。我也乘兴为友人写横披留作纪念。现在深圳已经是国际知名的新兴都市了，吴南生同志、梁湘同志及其战友们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埋没的。我的诗曾为他们敲过边鼓。

这次在广东写的得意之作，还有《新会鸟岛》。这个鸟岛，是众所周知的“小鸟天堂”，据说出于巴金同志的题名。传闻如此，我没有问过巴金。其实在那古老大榕树上分成日夜两班轮流栖息的，是大鸟而非小鸟，是成千的白鹤与灰鹤。这首诗不单是写景。疾风骤雨、低空云破处的千鹤巡天，是有所寄托、有所期待的。寓意不涩而难索解人，使作者引为憾事。

六、红树林卷（八十年代后期）

一九八八年二月，海南建省前夕，我应许士杰、梁湘同志邀，偕黄叶绿、吴桂凤同志访问海南。时值改革开放热潮中的海南热，多年来封闭荒凉被人遗忘的我国南海宝岛，一旦运转鸿钧，走上新时期的光明大道，到处喜气洋洋，都看到前程似锦。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周游了琼岛的东南西北。这是一次生动的史地人文政治课。

学习心得，著有《海南日记》（收入拙著《江海日记》一书中）。途中写诗，也收入其中。

《红树林之歌》这个大约一百四十行的诗篇，是《海南日记》的压卷之作。它写到了琼崖纵队的艰苦斗争（那是一切艰苦中最艰苦的：与侵略者斗，与反动派斗，与毒蛇猛兽斗）；写到了海南人民屡经挫折而不失信心；也寄托了诗作者对于迈步前进的宝岛人民的一片赤忱。万万想不到，好容易重建信心的海南人，又遭到建国以来的第三次重大挫折。我相信海南省现今有了新的贤明的领导者，相信海南人民的红树林精神。写到这里，我不禁重提《红树林之歌》中的回答句：“海南，能飞吗？——能飞！能飞！我们练就了雄鹰的翅膀。海南，能行吗？——能行！能行！我们紧紧依靠着祖国母亲。”“红树林，红树林，我们在琼山琼海扎根，我们跟大海大洋结亲。”“十二级台风奈我何？风里浪里更精神！”

在海南旅游期间，还有一首《鹿回头歌》，是怀着同样赤忱写下的。可读。

一九八五年春天，我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这年抽身到各地走走，呼吸些新鲜空气。所到之处，不免写诗留念。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两度《江汉行》。前者十二首中，《黄鹤楼》《登白帝城》《屈原纪念馆留字》三首，多少有点新意。后者《三国赤壁》澄清了东坡居士《念奴娇》中以黄州赤壁当成三国赤壁形成的长期沿误：“奈何轻信‘人道是’，从此长江两壁赤？”可算得文坛佳话。后者的小结《江汉行》五言歌行，写出这次告别武汉时喜而复忧、忧而复喜的心情：“骅骝奋蹄日，长轡勒缰绳！军令如山倒，相顾众目惊！”画出了大建设中一度猛放猛收时的惊愕情景。这首诗开头“少年涉江去”一段警策语，抒写了长久以来的心头积愆。此后句句是怀念，句句是感慨，却也自我排解了。两束《江汉行》中，也还有几句可喜的短章，有时用于为友人题写条幅，无须多说了。

七、星海园卷（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写诗少，大概是花了些时间编书（《惜春文谈》和《江海日记》），也多少还了些文债。一九九〇年深秋，曾有汕头、深圳、广州之游，事后将一路诗作附以题记写成《粤海诗记》。诗作在报纸上陆续发表过。我把完整的《诗记》编入这本《诗存》。其中殿尾的《星海园沉思录》，是怀着满腔热血、噙着满眶热泪写成的，希望在诗友、文友、乐友和青年朋友中引起同感。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随一个作家小团沿古代丝绸之路走访甘肃河西走廊，拜谒了敦煌莫高窟。郭沫若同志生前未曾到过敦煌，临终引为憾事。我这次受到热情接待，终身难忘。旅行中一路题写旧体小诗，汇为《丝路短歌》十首。诗意深浅不齐。去一趟拈一句也是难得的，也就一并留下了。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适逢我九九八十一岁生日，戏作《小诗自寿》（七绝三首），用以自娱自勉。唐达成同志在一篇文章里披露出来了（《收获》杂志一九九七年第一期），稍后我也在文章里引用过。爱我的关心我的朋友们，可从我不老的诗情中引得一笑。这些诗句，是从我乐观的心胸中自发流露出来的。眼看今年秋天，又临到我的八十五岁生辰，大概从心中也只能流出这样的诗句了。

歌词《人人心里有个周恩来》，本是为去年北影拍摄的文献纪录片《周恩来与文艺》写作的。没能用上。据说今年将用于二月间在广州举行的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等十五团队六十周年时共同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的文艺晚会。希望借此表达文艺界共同的心声。

谈 心

写完了以上的说明书，现在该静下心来，跟我的年轻读者们谈心。请注意，这是一个年过八十四岁的老诗人跟本世纪末、特别是跟二十一世纪的青年读者谈心。再过若干年，光未然（张光年）这个好听的名字，连同他的多情的诗笔，都将从人间渐渐消逝了。

我在新年伊始、临近春节时候说这些话，是不是太不吉利了？须知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死亡的威胁。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我对我国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始终保持乐观的信心。

我是从旧中国长大的。我同苦难中争自由的人民一同成长。我写诗，写文，写书，我奔波流徙，我勤奋地工作，都为了多少有助于人民的自由解放，包括青年人精神上的解放。我的诗歌多半同当时的政治斗争、政治方向保持紧密联系，就因为这种政治斗争、政治方向同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的。现在看来，这些诗歌的某些政治内容过时了，可是它的精神与骨髓并不过时。我并不主张诗人句句不离政治。我的这本诗集中，也有些山海写真，闲情偶寄。但我不赞成今天的某些诗人与作家借口那些虚假的、极左的政治误国误民而声名狼藉，于是走向另一极端，漠视公众的喜怒哀乐，醉心于个人的身边琐事。这种唯我主义的文学，是不会有长远生命力的。他写他的，我们不看。他不关心别人，别人也不关心他。本书《红树林卷》中，有《屈原纪念馆留字》一首：“热泪滂沱琼玉篇，文苑受惠两千年。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灵感吊屈原？”其最后一句，原是“何来面目吊屈原？”八十年代发表和编集时，觉其太露太直，将它改得“温柔敦厚”些。这次编书，恢复了“何来面目”的原貌。

我对自己的诗作从不自满。我对五十年代精力充沛时未能写出动人的诗篇，特别感到遗憾。那是一个狂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待知识分子不公道的年代。我误解了“思想改造”的方向和

目标，作茧自缚又帮助缚住他人。本来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年代，却经不住一阵阵冰雹冻雨的袭击。直到经过十年浩劫的惩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这个老共产党员——以人民自由解放的使者自命的人，才一步步觉醒过来，力求跟上新时期文化战士的脚步。直到现在，我还没能紧紧抓住当代那么多闪光的素材，写出闪光不息的诗篇！我还不服老，我要继续努力。

大家看到，我的大部分诗歌，是在抗日战争、民主斗争中产生，在歌咏会、朗诵会上发表，在旅行访问中即景抒情的。脱离了群众，离开了新鲜事物的激发，就写不出新鲜活泼的诗句。回想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在上海，在武汉，在大西北，我本身就是歌咏队、合唱队的一员。我和青年同志们一起，登台唱出经作曲家美化了的自己的诗句而振奋不已。在重庆，我和徐迟、高兰、方殷、常任侠、臧云远、王亚平等诗友们多次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厅座上轮流朗诵自己的新作，有时郭老、老舍也赶来参加，一时传为盛事。在昆明民主运动热潮中，我和闻一多、吕剑、韩北屏及联大新诗社的同志们在群众集会上高声朗诵，台上台下的激情打成一片。在北京，在欢呼“四人帮”覆灭、哀悼周总理逝世的万人大会上，我和诗友们、演员们倾吐积压已久的诗情。我有幸参与了这些有声有色的诗歌活动。我们的诗，是对于英雄业绩、美好事物的赞颂；也是对于侵略者，对于反动派，对于邪恶事物的鄙弃和声讨，是大时代的怒火之花。

从艺术形式上着眼，我的诗比较注重音乐性，注重诗句诗章的节奏与韵律，它的抑扬顿挫，它的朗诵效果。我尊重别人的散文诗，无韵诗，纯粹的诗。我自己总是押韵的，像鲁迅所要求的，押大致相近的韵。我写旧体诗，力求平仄与韵脚的运用自如；如果是律诗，也力求对仗工稳。写新诗，也注意于节奏音韵的自然流畅，韵脚的前后呼应。想活泼些，就随时换韵。要豪放些，宁可一韵到底。方便的时候，也不妨留意于音色的挑选或转换。昂扬的音色和灰暗的音色，情绪的效果是不同的。近年有时读到青年新锐的诗作，用笔的新颖，想象力的千姿百态，变幻无穷，使我自愧弗如。